第一章

黄埔谁不识周君

周恩来踏上广东热土

1924 年 9 月,当 26 岁的周恩来站在佛山号轮船的甲板上，凭栏远眺广州长堤码头时，脸上已没有了四年前出国时的稚气。这一方面是历时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脸上也有一些疲倦，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些；更主要的是，虽说旅欧只有四载,这四年间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远比海上航行颠簸得多，已经将一个瞪大双眼探求世界的青年学生，塑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

这在他那双大而亮的眼睛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虽说他的目光依然柔和，但已经有了一种威严，一种无须语言就可以发布的命令，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违抗者会变得战战兢兢或不大自然。这使我们想起军人，一个老练的指挥员常有这种目光。

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里，他正在走向成熟。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有一一点他确信无疑 那就是他会面临更大的风浪，担负更繁杂的任务，面对各式各样的政治态度和面孔。因为再不是远在柏林五尺斗室遥想中国的‘隔岸观火”,也不是巴黎西部宁静的布伦森林露天咖啡茶座上的“纸上谈兵”，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切都是面对面，眼对眼。

到码头迎接周恩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派来的阮啸仙(秘书)和彭湃(委员)。阮啸仙可能在参加五四运动时见过周恩来，而彭湃则是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他们站在预先约定的地点，等待周恩来的到来。当一个穿着一身白西装和一双旧皮鞋，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都认出了对方就是要找的人。

彭湃接过周恩来的皮箱："走吧,先住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在文明路贤思街。就是挤点。"

他俩一见如故。因为不仅彭湃在广东就听说过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周恩来也知道彭湃在这一带的活动。还在旅居法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对彭湃在海陆丰从事的农运感兴趣，曾在《赤光》撰文作了介绍。

周恩来跟着他们往外走,问："能有个办公的地方吗？"

彭湃笑了："还没住下就要办公啦？有，我们自己地方小一点，先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一间房子，给你临时办公用。"

"广州形势怎么样？"周恩来边走边问。

彭湃撇撇嘴,摇摇头。他告诉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了革命者众望所归的根据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成了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孙中山还聘请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来训练改组国民党。每天都有革命青年涌向广州，这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权利。你在街上一走，随处可见张贴的红色标语，不时会有一队群众呼着革命口号擦肩而过。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察，在热闹的表面下，正有一股股恶水在涌动。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实际能管辖的地区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

明手里。广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队伍。他们盘踞的地盘，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以为孙中山的队伍原来如此。孙中山本人更是无言以对，他曾经毫不隐晦地对杨、刘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践踏我的家乡。

“他还没有自己的部队？”周恩来有些疑惑。

“是的，他为此事十分苦恼。过去他靠地方军阀吃尽了苦头，现在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同军阀没什么两样。”阮啸仙告诉周恩来，“所以他力办黄埔军校，就想以此培养自己的军队，摆脱军阀的控制。”

“孙中山亲自担任黄埔军校的总理，校长是蒋介石，孙中山对其颇为信任。蒋本人也似要励精图治，治军也严，口号也左。党代表廖仲恺倒是个好人，与我们关系很融洽。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直为学员所不满，苏俄顾问有意让我们的人去担任。”

彭湃热情地介绍着，并希望周恩来将来能到黄埔军校去任职。他已经体验到，我们也迫切需要军队。周恩来初来乍到，一切将等待组织上的分配。他不知道他后来真的去了黄埔军校，并同国民党新起的将领蒋介石共事多年，乃至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

周恩来随广东区委的林务农来到彭湃的住处。这个地方实在太挤，原来住着彭湃、林甦、林务农，现在来了周恩来，还多了一个罗振声，五个人住着太挤。彭湃就说：“恩来同志，你一个人在这住吧，我们再找个地方。”

周恩来有些不过意：“我来把你们挤跑了，还是一起住吧。”

彭湃是出于真心：“你地形不熟，我有办法。”果然他又在东皋大道仁兴里 3 号找了两间房，四个人都搬了进去。

广东虽说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可人们难以想像在广州的共产

党员其实只有 20 人左右。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 20 来个共产党人，大多还随谭平山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原先党在广东的区委形同虚设。到了 1923 年 12 月便取消了，只留了一个广州地委。但形势的发展又非常需要一个大的党的组织。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委员长就由周恩来担任，同时兼任区委的宣传部长。说是广东区委,其实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可他却做了两件都与军事也都与大元帅孙中山有关的事情。一件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 10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欢迎孙中山北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这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不赞成孙中山北上；而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赞成孙中山北上。后来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广东区委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就是这年 11 月初,已经准备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与孙中山难忘的一见

谒见孙中山，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一件幸事。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周恩来多次称道孙中山的伟大：中山先生是真心实意和共产党合作的。

能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或者有一支至少倾向自己的武装，是不少共产党人的梦想。周恩来和陈延年也时常说起：“我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营造一支自己的军队，哪怕人和枪少一点。不然我们

将永远是别人的帮工。”

“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确很不方便。”陈延年也深有同感:“说起军事问题来，总未免感到底气不足。”

周恩来向陈延年描绘了一幅蓝图：先到外省征募兵员，把省内工团军、农团军中的合适者转为正规军，以黄埔学生充当军官，先建起一两个团。有了基础，再继续发展。

“一两团的武器,目前不成问题。”周恩来掂量着:“经费除了自筹一些外,完全可以向政府请领。”

“国民党方面能答应吗？”陈延年说出自己的担心。

“估计孙中山不会反对。他这一辈子几乎天天都在找军队，哪怕是军阀、土匪都不拒绝,要是我们建起革命军,他怎能不欢迎 我们建军的宗旨就是打倒军阀。”

两人越说越投机，就给还在广东的陈独秀写报告，请示组建武装。陈独秀对儿子送来的报告不屑一顾,还训斥了一顿:“不要异想天开,国共合作,国民党是主,我们是客。你们要掌握这个原则。”

气馁的陈延年回到周恩来身边时，对父亲的一套很不理解。周恩来安慰他:“独立的搞不成,可以在孙中山的名下搞嘛。”他早就看上了停放在大元帅府里的那几辆铁甲车。虽说铁甲车本不新，加上风雨剥蚀，已经铁锈斑斑了。

由陈延年陪同，周恩来来到大元帅府。在门口等候的宋庆龄已向孙中山做了通报，将他们引至客厅。周恩来向孙中山问好后，谈了要建立一支铁甲车队的事。孙中山静静地听着，稍微把头向宋庆龄那边摆了一下，很难觉察地点了点头：“它的全称应该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说话时脸色愈加苍白，搭在椅把上的手也有些微微颤抖:“我这几天就要北上,筹建铁甲车队的事，经费可找廖仲恺，人员可找蒋介石解决，他们都是我党最忠诚、最有觉悟的党员。”

周恩来代表区委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支持孙总理的北上，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信这个举动定能将革命推向北方发展，使国民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

从孙中山脸上已经可以感觉到肝病对他的折磨，但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他勉励着在座的青年：“我这次往北方去，一定和他们（指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周恩来诚意地点头。

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在他的桌上铺开了大元帅府的信笺。孙中山便牵过毛笔写道：

着周恩来同志全权筹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事。孙文

宋庆龄小心地盖上孙中山的大印，吹干墨迹，装在信封里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地告辞。这已经是周恩来第二次接到孙中山的“手令”了。在旅欧期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于 1923 年就与旅欧的国民党员王京岐开始国共合作，筹建旅欧国民党组织。同年 9 月，孙中山自上海颁发了一个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中国国民党通讯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筹备处筹备员。此状。总理。印。周恩来完成任务后，曾向国民党总务部长彭素民复命：“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先生及党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

周恩来拿着孙中山的手令，从黄埔军校调来了特别官佐徐成章，一期毕业生赵自选、周士第三人，从其他单位选调廖乾吾、曹汝谦，共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建队后，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中共党员。车队中建立中共党小组，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这是第一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

装力量，也是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铁甲车队成立不几天，彭湃就来搬兵。1924 年下半年以来，广东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成立武装与农会对抗，特别是广宁地区，地主武装都以高墙大院和堡垒建筑为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农会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农民运动面临严重的威胁。好些本已立约的减租协议，又被推翻了。农军虽然斗志昂扬，却由于武器差和缺乏训练，更无力进攻地主的据点。所以彭湃才来找周恩来，希望能从黄埔军校调点兵力。

周恩来将彭湃介绍给铁甲车队长徐成章。徐成章握着彭湃的手，笑着说："我们那些兵，也是才学会放枪，勉强能开着车跑。"

"这就可以了。"彭湃也笑了，"只要我们穿了军装，开着铁甲车上去，土豪们的胆子就要吓破了。"

"机关枪一定要带去。"陈延年顺便说了一句，"听说广东的军阀和土豪最怕听见机关枪的声音。"

蒋介石动之以"乡情"

黄埔军校在周恩来赴职前半年已经开学。6 月 16 日的开学典礼很隆重，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亲至军校致辞，虽然反对党诬称他是"孙大炮"，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就是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开学典礼上他讲得也很坦白："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俄政府资助 200 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 8000 支步枪和 500 万发子弹。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因为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各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开学那天，虽然学员们穿的都是粗

布灰军装,打赤脚穿草鞋,也未经严格操练,但个个精神抖擞,口令喊得震天。已使参加典礼的各派系的军阀们吃惊不小，有人当时就预料“:看着吧,将来得天下者必是这帮新军。”甚至有些眼热的军阀没等典礼结束就退场了，说是“看着不舒服”。远在北方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都感到了南中国的震颤，中国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崛起。所以开学以后军阀制造了种种困难来扼军校的脖子也不奇怪了。第一期学员最初有 490 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使学生总数上升到 645 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其中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红色风云人物,也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黄杰、张镇、贺衷寒等国民党军事要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与周恩来打交道的对象。

蒋介石是周恩来打交道最早、最多的国民党将领，也是最后的敌手。周恩来的才华吸引了黄埔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以至蒋介石谈起周恩来大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谁与共 ‘你我’之慨。他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终因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国民党黄埔将领一直是周恩来交往的重点。

周恩来到军校之前，校长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一套军服。周恩来穿上后还认真对着镜子整理了一番。在作为一个军人之前，他就注重仪表。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就在宿舍的一面大立镜旁贴了一张纸做的‘镜子’,上面写着他自拟的镜铭“: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肩宜平,胸宜宽,背宜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黄埔岛位于珠江之中，距广州 25 公里,它曾经是一个要塞,是掩护从海上向中国最大商埠的要冲。要塞建于 1870年,即鸦片战争之后。岛上仍然保留着当年海岸边用的炮。驻防军都是士兵世家，祖孙四代同时服役也是常事。把军校设在岛上，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让军校避免外人注意，至少在初期不至被某一支“联军”像吃小鱼一样吞掉军校。

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前行，黄埔军校的正门便在眼前。孙中山手题的‘陆军军官学校’校牌悬挂于门楣,那字浑厚有力,十分醒目。灰色的水泥门墩上写着一幅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加上一边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给人一种森严壁垒的感觉。

周恩来径直来到校长室。这是刚刚修缮过的一座旧楼，只有二层，两翼稍长，作为讲堂和办公室之用，这座楼的后面就是士兵居住的营房。蒋介石住在这座楼的二楼，从窗户可以俯视通往大门的庭院。居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右侧的大会议室，会议室紧挨着蒋介石的住房，即第二部分。会议室有侧门可通起居室。另有一间卧室住着蒋介石和夫人陈洁如。

周恩来走进会议室时，蒋介石已事先坐在那里。周恩来在蒋介石对面坐下，环视着房间。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和 24 把高背椅子。一边墙上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挂有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图上插着绿、红、蓝色的小旗子,有些代表各方部队的位置，有些代表工事或危险地带。

当时蒋介石不到 40,脑袋不大,头发稀疏。他坐在那里,凶狠的目光不安地转来转去。他的举止矫揉造作，竭力保持一副军人的仪表。在听取周恩来谈话时，他不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以此表示他的赞许。他的笑声是虚假的，笑的时候眼神仍然是凶狠的。

“早就听说你来了，只是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交谈。”蒋介石一边说,一边掏出便条本,在上面写上几句话,又装进口袋,然后继续交谈。他问道:“听说你是浙江人?”

“应该说是江浙人。”周恩来浅浅一笑,“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

“很好很好。”蒋介石显出极大的热情,双肘撑着桌面,仿佛要站起来:“咱们是同乡啊,绍兴离奉化不远,中间只隔着四明山。我最早的名字叫周泰，我们可以说是同宗同族。否极泰来嘛，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今后要相互提携。”蒋介石越说兴致越高:“我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与我结拜兄弟的,姓周的特别多,如周淡游,周知外,周采臣,还有一个与你的名字最像,叫周飞来。”

“的确很像。我的字为翔宇,写文章也用过飞飞、飞的笔名。”

蒋介石陷入乡情的回想,转而又问:“你有女朋友吗 有的话可以接来军校同住。没有的话,我可以托人给你介绍。”刚建校时,蒋介石为了笼络学生，特别是与他同乡的学生都要个别谈话，谈话内容除了勉励外，多有两问：一问家中有无未婚妻，二问袋中有无银元,没有的话,他都可以帮助解决,以此培植自己的势力。

周恩来点头，表示已有。也表示将来愿把女朋友接到广州，但现在第一步是搞好政治部的工作。

一提政治部,蒋介石马上摇头,表示他的不满:“政治部主任已经换过几任了,但都无起色,有辱于总理对军校的重望。”

军校的政治部机构最初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戴季陶虽是个作学问的人，当时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但他表面上拥护联合战线，心里却极力反对共产党。他时常给蒋介石吹风，说让共产党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当正菜。所以军校一派‘左’的风气,他不久就辞职离校回上海去了，张申府也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中间几个月无人负责,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是前清举人，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平时住在广州，每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来一次，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除了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把政治

部办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师生十分不满,提出‘ 加强政治部,撤换邵元冲 ’的口号。这才请来了周恩来。

蒋介石认为军校政治部应该“ 维持军校的风纪军纪。要严密检查。校内有无男女混杂、鸦片赌博及不端正的事情发生，不单校内如此,就是本校学生有无骚扰民间事情,也应该严密检查。”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但对政治部他有更多的设想：“ 我想第一步是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制度，在政治部之下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一期毕业生中选人担任各股主任。以后再出版一些士兵刊物，每日发给学生和士兵…… ”

“ 很好。学校组织党部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你们军校成立党部，一定办不好。因为军校的性质是要极端专利的，完全不能拿党员平等的精神治理的。如果有什么政治工作，或要养成什么自动能力，是绝对办不好的。我信他们的话。但学校如果办得不好，就被他们那些旧脑筋的人猜中了。以后想再灌输一点政治知识到别的军队里去，也不行了。所以望君多多努力。我这几天起了两种草案,一种是《新兵精神教育问答》,一种是《革命军刑法条例》,已呈请中执委员会审定,审定之后,你们可以颁行。’蒋介石从皮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稿纸,将上面的一页递给周恩来‘; 这是我编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又写了个序言,你看一看,争取早些发给学生。”

蒋介石送周恩来出门时故意显得彬彬有礼。不仅是共产党，甚至在国民党左派中对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很是费解。因为几年前他还是上海滩那种在证券交易所里消磨时间的“ 飞黄腾达的青年 ”，如今竟老成持重了，并成了谈论革命词藻的一把好手。回到广东区委,周恩来翻了一下蒋介石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所写的自序,不仅皱起眉头。他跟区委的陈延年交换看法：“ 蒋介石这个人很是奇怪，他每天都要给学生进行精神训话，一面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歌颂列宁，高喊打倒军阀，可一面又编这种封建军阀的语录，以此治兵。他到底是革命呢,还是不革命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陈延年也似已看透“这不奇怪,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的影响。他对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式的治军思想很欣赏，大概是想建立一支效忠他个人的私家军队。他也是想利用我们。”

另一位区委接茬说：“这也容易，他利用我们，我们也利用他。蒋介石这种在交易场上混出的人物，知道怎样积攒，何时抛出，何时翻本。”

周恩来态度更缓和一些：“既然中央倡导国共合作，我们现在还应与他和处，不必去纠正他。鲍罗廷一再跟我说，你不可冒犯他！我想现在要紧的是发展我们自己党的力量。铁甲车队就可以作为我们党的武装的一个开始。”

“现在军校有多少党员？”陈延年问。

“连我 43 个。”

“支部应早些建立起来。我看还是由你代表区委直接领导。”周恩来的主要精力用在黄埔军校，广东区委书记的职务就由他的助手陈延年担任，周恩来则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陈延年望着周恩来，希望他能接受。周恩来点了点头。

周恩来确认打击的主要对象

黄埔军校从它一开始，两派政治势力就在明争暗斗。师生中两个最大的群众性组织，一个是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右派官兵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是针尖对麦芒，一有机会就斗。轻者唾沫相溅，重者拳脚相加。有时双方的人相互揪着打到政治部，都被周恩来一一化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蒋先云和贺衷寒的争斗了。他们分别是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巧的是这两个人都来自湖南，都有一股辣椒的火气；连两个人的别号都是一种象征：蒋先云

别号巫山 贺衷寒别号君山 ,真是两个人可以相见,两座‘ 山 ’搬不到一起。两个人个头差不多,都是一双大眼睛,只是蒋先云脸稍长,贺衷寒脸偏圆。入黄埔前，两人在湖南都有些名气。五四运动时，蒋先云是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贺衷寒是武昌湖南旅鄂中学的学生领袖。1921 年,两人都有过辉煌 蒋先云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委派到安源煤矿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后来又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因遭反动当局通缉，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贺衷寒在 1920 年秋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其不服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领导，回国后被开除团籍。此后在武昌教中学,办了个“ 人民通讯社 ”,不久被北洋军阀封闭，后来考入黄埔军校，跟蒋先云都编在学生第一队。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在学生中很有威望,被人称为‘ 黄埔三杰”(另一人是陈赓)。周恩来到校时,第一期学生正好毕业,蒋先云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贺衷寒则在周恩来手下任政治部上尉秘书。1925 年 1 月,蒋先云和贺衷寒等四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但贺衷寒很快闹起了独立,同年 4 月，他发起成立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从此两人水火不容。蒋介石一直视这两人为奇才，但政治色彩的天平渐渐倾向了贺衷寒，使贺衷寒在官衔上总要稍稍高于蒋先云。但周恩来更看重蒋先云，常常指导蒋先云编辑出版《中国军人》杂志,发展会员。他要求青年联合会的主要成员蒋先云、李之龙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以自己的宣言和行动团结更多的学员，不要纠缠小事；他也找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谈话，要求他们以打倒军阀推翻封建为宗旨，不要在军校制造事端。当时也有一些学员如杜聿明等在组织上不介入任何一派，他们对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情感一直伴随他们一生。甚至几个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将领也颇有同感

与陈赓一同入校的同乡、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回忆道："及至11月间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循循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报考黄埔军校一期落选，由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第二期步兵科的王大文也说："我进入黄埔第二期后，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讲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应该怎样进行革命……周恩来主任那时还是青年，英俊严肃，穿着军装，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调铿锵，配以有力的手势；讲话内容深入浅出，并饶有风趣，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曾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线指挥所中将代参谋长的黄埔四期生文强讲得更加详细，颇为动情：

"周恩来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认为他是一位高级的政治教官。说来也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我在政治科上大课时，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讲演，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国内外革命形势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课博而能约，条理清晰，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的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定安、周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定安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我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当年对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讲演都写有笔记保存在我妻子手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竟失散焚毁了，多少遗憾！"

周恩来的策略是现时不要去触动两个群众组织，对右派学生要多做争取工作。但陈独秀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让张国焘向陈延年

转达他的意见：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

“老头子糊涂了。”陈延年说的“老头子”是指父亲陈独秀。再加上弟弟陈乔年，这父子三人构成了一个传奇的革命家庭。但这三人之间对于革命的理解常有分歧。陈延年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成立较早而又合法的组织，而孙文学会却是未经许可新成立的右派组织，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张国焘对陈延年的态度很不高兴。

“我要向革命负责。”陈延年说话声音很低。“这件事要等恩来从黄埔回来，才能决定。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自理办法较为妥当。”

周恩来回来后，解下压在肩上的武装带，听陈延年在说：“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似有蒋校长的支持。”

周恩来肯定地说：“是的，但在蒋介石背后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戴季陶。”

张国焘有些奇怪：“你不是顶替了戴季陶的位置，他已经去了上海，怎么他能是蒋介石的后台呢？”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右派中最危险的家伙就是戴季陶。他也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但他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他的‘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从广东讲到上海，他人虽然离开了黄埔，孙文主义学会还是把他奉为旗帜。所以我们应该批驳戴季陶的学说，才能使盲从的学生猛醒。”

张国焘答应回去跟陈独秀再商议一下。

而“青军会”的负责人之一、毕业后也分配在政治部管总务的

李之龙已经领会到周恩来的策略，他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快画了一幅后来很著名的漫画，画面是：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手捧一本《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去，旁边站着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叫好。这是一幅很有讽刺意味的画“青军会”,很快翻印,张贴在军校内外,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也看到了漫画，想发作，又觉众怒难犯，就把人称他的“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叫来,训斥了一顿他不长眼。王柏龄心领神会,又招集贺衷寒等人想点子“反击”……

砰——

突然间，黄埔岛上一声枪响，把军校师生吓了一跳，以为是军阀来袭，纷纷枪弹上膛，拥至操场。正在军校政治部值班的李之龙携带手枪，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操场，一看四周并没什么敌人，只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个头目林振汉气咻咻地握着枪。李之龙大声喝问：谁违犯军纪随便开枪？这时“青军会”成员李汉藩正在掏枪，准备还击。显然刚才他是林振汉射击的目标，幸未击中。李汉藩情绪激动,被李之龙制止：有什么事,说不准开枪。”李汉藩指着林振汉大骂：孙文主义学会故意挑起事端,攻击我青联会,林振汉不是东西,违抗军令,开枪打人,请求政治部按军法处置！”

林振汉也在强辩：“我说错了吗？你们青军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鱼目混珠,阴谋篡夺领导权……”

李之龙喝住他：你不要污蔑了,走,找党代表处置。”李之龙很聪明，因此事涉及政治部，周恩来不便处理，所以直接找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廖仲恺秉公而断，立即决定将林振汉撤职查办。

王柏龄可不服气，去找廖仲恺和蒋介石。蒋介石觉得这帮孙文主义分子无用，又痛恨学生动枪，碍于廖仲恺已经做出决定，只好

维持原判。王柏龄就改变方式，采用特务手段，暗中派人监视共产党人，限制“青军会”的活动，甚至在深夜盗窃共产党的文件和拆阅党员信件。李之龙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即召开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大会，讨论反击右派的问题。大家的心情和李之龙一样，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进行还击，彻底打断蒋介石在军校的“第一只手”。

周恩来比激动的学生们要冷静的多：“同志们，右派如此猖狂，我们一定要给以有力的回击。但今天我要请同志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和维护这种合作，同一切破坏合作的反动行为作斗争。所以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要做到言之有理，行之有利，斗之有节，不让右派钻空子，乘机造谣惑众，反咬一口，以达到其反革命之目的。”

周恩来的话引起众人思考。

周恩来再次强调，虽经发展，军校目前的共产党员也只有 43 人，占全校师生极少数。所以最重要的是站稳脚跟，扩大影响，不要失去阵地。“第一只手”王柏龄无机可乘，渐渐地威风扫地，被众人嗤之以鼻。连蒋介石也指着他的鼻子骂：“盯梢，偷信，有什么用？你蠢嘛，你去学学周恩来！”

张治中两难

周恩来随同蒋介石东征以后，留校的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附、代理总队长张治中时常听到前线传来的消息。尤其是周恩来创造的一套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周恩来和宣传队员们一起编写的一些口号和安民告示，如“人有良心，则必杀陈炯明；人能辨别是非，则必杀陈炯明；人要救我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痛苦，则必杀陈炯明”；《爱民歌》：“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简明扼要，还琅琅上口。这对于张治中这个在旧军队中呆过而又爱好新鲜事物的人来说，确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